

大家西学

市场二十讲

秋 风 编

那只看不见的手，不想看看它的手相吗

Free Market

天津人民出版社

F014. 3/22

2008

大家西学

Life Market

市场二十讲

秋风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二十讲 / 秋风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6

(大家西学)

ISBN 978-7-201-05818-4

I. 市… II. 秋… III. 市场经济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030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市场二十讲

编 者 秋 风

责任编辑 章 桢

丛书编辑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www.tjrmcbs.com.cn

邮 箱 tjrmcbs@126.com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5818-4

定 价 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大家西学：二十讲系列

总主编简介：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选举社会及其终结》、《道德、上帝与人》、《公平的正义》、《伦理学是什么》等；译有《道德箴言录》、《沉思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论》（合译）、《伦理学体系》（合译）等；编有《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生态伦理》等。

《大家西学：市场二十讲》

编者简介：

秋风（姚中秋），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领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已出版《立宪的技艺》等著作，《哈耶克传》、《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等译著10余种，并在多家报刊开设经济、政治评论专栏。

大家西学：二十讲系列

第一辑：

- | | |
|------------------|---------|
| 1. 《大家西学：信仰二十讲》 | 何光沪 |
| 2. 《大家西学：正义二十讲》 | 万俊人 梁晓杰 |
| 3. 《大家西学：科学二十讲》 | 吴国盛 |
| 4. 《大家西学：自治二十讲》 | 王建勋 |
| 5. 《大家西学：性爱二十讲》 | 李银河 |
| 6. 《大家西学：婚姻二十讲》 | 萧 瀚 |
| 7. 《大家西学：战略二十讲》 | 时殷弘 |
| 8. 《大家西学：音乐二十讲》 | 贾晓伟 |
| 9. 《大家西学：财富二十讲》 | 贺力平 |
| 10. 《大家西学：自然二十讲》 | 刘华杰 |
| 11. 《大家西学：市场二十讲》 | 秋 风 |
| 12. 《大家西学：美德二十讲》 | 蔡 秦 |
| 13. 《大家西学：平等二十讲》 | 何怀宏 |
| 14. 《大家西学：哲人二十讲》 | 马永翔 |
| 15. 《大家西学：善恶二十讲》 | 龚 群 |

第二辑：

- | | |
|--------------------|-----|
| 16. 《大家西学：大学二十讲》 | 杨东平 |
| 17. 《大家西学：公共性二十讲》 | 谭安奎 |
| 18. 《大家西学：知识分子二十讲》 | 崔卫平 |
| 19. 《大家西学：宪政二十讲》 | 萧 瀚 |
| 20. 《大家西学：法治二十讲》 | 秋 风 |
| 21. 《大家西学：行政二十讲》 | 郑春燕 |
| 22. 《大家西学：民主二十讲》 | 刘军宁 |
| 23. 《大家西学：生态二十讲》 | 杨通进 |
| 24. 《大家西学：权力二十讲》 | 丁一凡 |
| 25. 《大家西学：幽默二十讲》 | 李 静 |
| 26. 《大家西学：人权二十讲》 | 何海波 |
| 27. 《大家西学：童年二十讲》 | 王 甘 |
| 28. 《大家西学：自由二十讲》 | 何怀宏 |
| 29. 《大家西学：美国二十讲》 | 金灿荣 |
| 30. 《大家西学：美术二十讲》 | 贾晓伟 |
| 31. 《大家西学：幸福二十讲》 | 周国平 |

策 划：益琳福
丛书编辑：邹小娥
本书责编：章 兢
美术编辑：兰 馨
装帧设计：陆智昌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中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意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的“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 20 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 20 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欠缺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 30 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 Society 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 年 7 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秋风

为维持生存及改善生活，人们需要享有各种产品与服务。根据人类的经验，生产及供应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方式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大方式：第一种就是市场经济，第二种则是计划经济。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人有交换的本能。文明社会基本上很自然地选择了用市场的方式来组织其经济活动，这种市场甚至是全球性的（丝绸之路就是全球化的雏形）。只不过，早期由于宗教或道德抑制过于强烈，更由于法治不够健全，市场始终受到限制。到了 17 世纪，在英国，法治制度终于稳固地建立起来，新教伦理又为人们发财致富的活动提供了道德上的许可，于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经济终于发育成熟，又在美国继续发展，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

市场中的私利与公益

市场是平等的个人自愿地进行生产、服务、交换的机制。市场经济就是指一个经济体主要依靠市场组织其生产、交换活动。

市场的活动主体是平等的个人及个人自愿组成的社团——企业。个人、企业都在努力追求增加自己的利益。自市场出现以来，很多人反对市场的主要理由就是，市场活动主体——不论是商人、工厂主，还是跨国公司老板——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认为，假如人们为了增进他人利益而从事经济活动，可能更有利于实现某种理想社会。

现代经济学正是从直面这一伦理问题而起步的。所以，本书第一讲摘录了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阐明了：个人出于私利考虑而采取的经营活动当然会增进个人利益，而同时也给他人带来了好处。因而，这种活动增进了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曼德维尔又说，假如人们纯粹基于公心，社会生活反而会陷入停滞。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斯密说，个人确实都以改善自己的境遇为其行为动机，但是，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却有益于公共利益。

不过，“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似乎并未明确阐述。推测起来，它应当就是宗教、道德规范、产权制度、法治等等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

市场的机制：交换、分工与全球化

同时，市场的运转机制也可视为另一个层面的“看不见的手”，它们引导个人通过服务他人增进自己的利益。

在一个大社会中，任何人都难以生产出满足自己全部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所以，人们倾向于进行交换。斯密说，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则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交换能够增进人的效用的满足。

当然，门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是主观效用。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本上是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最终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并且被人发

展出很多荒唐的政治结论。门格尔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人则提出了主观价值理论，这其中以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阐述最为系统，其主观性也最彻底。

根据主观价值理论，价值就是经济人就财物、服务等对于自己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它只存在于经济人的主观意识之内。因而，同一个物品在不同人那里具有不同价值。正是由于这一事实，人们才自愿地进行交换。而通过这种交换，双方的效用都增加了。因此，任何买卖活动，只要是自愿的，就必然是公平的，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所期望的收益。

这种交换会促使市场分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讨论了分工理论。斯密认为，分工提高了效率，从而使所有人的收入得到增加。分工范围的扩大与深化，乃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源。

这种分工自然地具有突破国界线的趋势，因而，市场经济自然会走向全球化。假如承认分工的好处，就必然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李嘉图对此则提供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证，即“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之所以是可取的贸易政策，是因为自由贸易的双方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使在所有方面都略逊一筹的国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也比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更有利于增进本国国民的利益。

市场的机制：价格、企业家、利润与竞争

根据上述主观价值理论，价格是交易双方基于对同一物品的估价而进行讨价还价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价格不是由客观的供需决定的，因为这种供需量是交易主体无法掌握的，价格是由市场参与者对于供需及其他相关情势的认知所决定的，并且不断处于调整过程。因为一旦价格被交易主体所确定，就成为他人进行决策可以参考的客观数据。其他人为为了进入市场，必须尽最大可能报出更低价格。

这就形成了竞争。竞争总是与价格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通过市场已

经确定的价格，个人和企业来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这个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并计算自己有没有能力进一步压低价格，从而争取到更多消费者。因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一致同意，价格信号是市场的神经中枢；如果政府干扰价格信号，就会导致市场扭曲。

一方面，价格这个信号一方面在指导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企业家又在发现价格。诚如哈耶克所说，竞争是市场内在的一种发现程序。竞争的压力迫使每个企业家都去寻找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为此，企业家当然也积极地发现新的生产工艺、技术、流程，以及企业组织形态、产业整合结构等等。

正是通过这些创新活动，企业家获得利润。利润是市场给企业家的一种报酬。在米塞斯、熊彼特、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市场演进的主体。他们所说的企业家，更多地是指市场中承担一种特定功能的人，即基于成本收益计算而进行创新活动的人。由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家不断地发现乃至创造消费者的需求，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更有效的办法，从而发现价格，并依据价格发现成本。

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价格是由竞争过程决定的，成本则是由价格决定的。而利润就是企业家因为对未来作出了正确预期及采取了正确策略而获得的报酬。如迈克尔·波拉尼所说，利润是企业的一张记分板，借此，企业可以知道自己的表现。那些亏损的企业会被淘汰，相比之下，这些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肯定低于保留下来的企业。因而，利润乃是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关键机制。

基于这样的竞争及利润理论，哈耶克等人指出，竞争是一个过程，而一个产品市场只剩下一两家企业，很可能表明此时效率达到了最高。这种状况并不构成垄断，只要潜在的竞争者的进入不受政府限制。可以说，唯一的垄断就是政府授予并且使用权力维护的垄断；而市场过程中所出现的独占或者两三家寡头独占，都是暂时性的，随时都可能被打破。

市场的制度基础：道德与法治

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市场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制度，原因在于，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需要相当苛刻的制度基础。

首先，市场需要某种伦理基础。曼德维尔、斯密等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强调的是个人摆脱过于严厉的道德约束，承认个人可以基于自利之心从事经营性活动。这为市场的发育创造了某种宽松的道德气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指出了，必要的、温和的道德规范对于市场的正常运转，是绝对必要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部分就是指这种道德约束；正是借助这种约束，个人基于自利的活动才不至于变成损人利己的行为。相反，尊重他人、诚信、尊重他人财产权等等基本的道德规范，引导个人采取通过服务他人以增进自己利益的策略。这样的市场才会真正做到曼德维尔所说的“私人之恶、公共之善”。

哈耶克也认识到了道德对于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性。他在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的最后一章中指出，传统宗教所进行的道德教化，能够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某种基本的道德规范，而这些规范维系着家庭和私人财产权制度，这些乃是市场和法治的基础。

其次，市场要正常运转，需要个人享有一些基本的自由、权利，尤其是确获保障的私人产权。离开了自由的个人和私人产权，就没有市场的自愿合作交换可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对经济史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此处所说的个人自由权利与确获保障的私人财产权，不是指不存在私人之间相互侵犯人身和财产权的事情，而是特指政府对个人生活及私人财产权的干扰、侵害，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因为私人之间相互侵犯人身、产权，这是常有的事情，而任何政府都会对此予以惩罚。问题的关键是，在大多数国家，政府经常侵害人身自由和私人财产权，从而妨碍市场之发育。而在英国，通过法治、宪政制度的建立，政府的权力被戴